

想象视域中的二律背反：论《爸爸爸》的现代性面向

吴兴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文学现代性是在文学自身发展流程中出现的与前现代文学的异质性与反叛性特性,《爸爸爸》于想象视域中体现出二律背反,即反抗传统又依赖于传统的文学现代性。在小说中体现了对以丙崽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讽刺,嘲讽中又流露出某种现代性的赞美与肯定。文本通过对背景人物的描写,体现出对传统的突破与反抗,本文从《爸爸爸》中现代性这一因素本身的矛盾张力和不成熟特征,分析其文学现代性与传统的杂糅与不纯粹,以及现代性的乌托邦色彩、神秘色彩、人的现代性开启与遮蔽、文本现代性的缺失等等,而这些都预示着“寻根”小说的现代性仍然只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关键词]想象;二律背反;《爸爸爸》;现代性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3.1770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爸爸爸》从一出场就被各种解读,总体上仍不离对传统落后、愚昧、停滞那一面的批判的字眼,很多人将目光落在民间去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这过程中,我们再一次触碰到传统所留下来劣根性,那些落后的东西根深蒂固地融进人们的骨髓,这让我们不得不去批评、去反思甚至在目睹后仍不免惋惜感叹如何才能撕去这几千年来的标签。但是所幸的是在那些根深蒂固的丑陋面孔下我们却窥视到一些从未有过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些新与旧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但是它却实实在在的出现、存在,仿佛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很多新与旧的碰撞开始有了新的质变,产生一种我们暂且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本文试图从《爸爸爸》中探讨其文本对传统以及现代性的一个态度,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韩少功笔下对现代性的解读以及传统与他想象的现代性所产生的二律背反。

一、反现代的“现代性”想象

作为西方语境与文化中的“现代性”往往被概括为“现代化的产物”,是作为一种社会范畴来指向社会剧变所呈现的现代性质的,其突出体现为与前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冲突性与反叛性,“现代性本身就具有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1]《爸爸爸》以批判传统为着力点,凸显被宗族礼法所长期遮蔽、毒害、扭曲、压抑的个体以及群体,进而在一种新的语境下展开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想象。由于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小说视域中的“个体”是无法真正离弃“群体”的,故事的最后,当所有人选择走向死亡或逃离鸡头寨这个地方,丙崽似乎被群体所遗弃一人留了下来,但这依然改变不了鸡头寨即将消失的事实。叙事落脚到民族文化的立场,矛盾贯穿始终,即反抗传统又回归传统,这种叙事的二律背反恰恰体现出《爸爸爸》中所蕴含的现代性特质。

韩少功在对“丙崽”这个命运的感知与探索中,在与异族文明的鲜明对比中,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深刻且复杂的情感体验。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包括小说现代性)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对都市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想象。^[2]知识分子的“想象民间”和“民间想象”是有区别的。“想象民间”是知识分子从自身角度对民间的想象,包含知识分子自身对民间的认识、感悟与理解;“民间想象”则更多地体现出依据民间自身的文化特点、心理逻辑对于民间生活的想象。韩少功扎根于农村对于民间的描写和想象更多的是从民间本土立场出发,依据民间自身的特点进行展开描写的,因而是更加真实和深刻的。

如果把文学现代性界定为对文学传统及文学自身双重冲突所导致的悖论,那么,《爸爸爸》这篇小说所折射出来的现代性无疑是鲜明对。但是,由于韩少功对传统的态度极为暧昧,在对传统的反叛过程中充斥着浓厚的感伤怀旧情怀与同情怜悯情绪,使得他的文学价值立场始终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的现代性可能是一种杂糅的现代性和不纯粹的现代性,人们在文本中所体验到的传统踪迹与反传统立场,正是作者将现代性置于想象视域中进行表达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小说在其文本中处处传达出对传统社会文化景观的批判与讽刺,批判的力度在丙崽的身上尤其明显,另一方面小说文本中虽流露出反抗传统但又同情依赖于传统,文本中对延续几前年的祭祀文化的描写,人们对神的敬畏之心,对村庄生死存亡的同仇敌忾,在鸡头寨与鸡尾寨的对抗中,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这些种种无处不在暗示着作者对于传统的依赖和肯定。小说的文学现代性实质上是根植于人的现代性的,即将“个体”的人的发现与凸显作为小说价值的主要表现对象,进而通过“个体”价值的丑化与毁灭对传统中的落后、停滞、野蛮的这一面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揭露,从而折射出想象视域下现代性散发的光芒。

二、“寻根”的困境：乡村与现代的碰撞

作为“寻根”作家的代表人物韩少功,在2013年发表的《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一文中,再次对寻根文学中“新”与“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系统化的归纳,对解决寻根文学之争作了学理化的阐释。韩少功指出,寻根文学兴起之初,来自民间的某些知识群体,还有文学界一些朋友认为“寻根”就是当没落文化的“守灵人”和“辨子君”,针对这种偏见,韩少功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强调寻根不是守旧与保守,而是“对话”与“创造”。这种“对话”和“创造”在他的代表作《爸爸爸》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对于丙崽形象的塑造以及鸡头寨的描写,作者并非简单的贴上保守、落后,停滞、畸形、扭曲等标签,而是刻意淡化故事背景、神化人物,故事的时间与空间变得游离不定,一切都是旧有、切实的事物但一切却又蒙上了新奇、神秘的面纱,具有了荒诞、神秘的色彩。新与旧的交织使得作者在面对传统与现代这一看似二元对立的命题时,选择了以“对话”的方式将二者糅合,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范式,由此作者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变得扑朔迷离。

叶舒宪认为,文化“寻根比喻背后的实质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处在文化变迁加剧时代的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背景中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它既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问题;又是迫在眉睫的当下性难

题”。^[3]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同样面临这一选择难题，如何取舍传统与现代，又或者怎样平衡二者？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选择问题，更多的是作家的价值取向与情感的依托，阿城在《棋王》中以推崇、敬畏的态度对民族文化进行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韩少功则在《爸爸爸》中对鸡头寨存在的丑陋文化批评否定，对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的深入的挖掘，字里行间无处不渗透着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

“寻根”文学的根是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的，这一点韩少功在寻根文学兴起之初就表明了寻根的立场，但是何处“寻”？寻根作家似乎不约而同的都把目光放到乡土，乡村世界及民间文化之所以能够作为传统民族文化的“根”，首先在于其相对于西方“拿来”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言，蕴含着“我们民族的自我”，“乡土是城市的另一面，是民族历史长河的一面镜子，哪怕是乡土的一梁一椽，一檐一角，都可能有的秦汉或明清的投影”；其次最重要的还在于其作为文化母体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和生生不息的活力，“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大多的属于不规范之列”，即这些文化没有经过官方的加工整理，涉及广泛，它们就好像野外的杂草肆意、野蛮生长，不同于温室里的盆栽，有人修剪、管理，使其规范化。这些“非规范”文化，“像巨大无比、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

韩少功指出乡村文化的“寻根”，实质上本身即一种顾此失彼、自相矛盾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想象。韩少功“寻根”文学中对乡村与现代的想象，显然不同于鲁迅、沈从文和赵树理为代表的对这一命题的解答。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是以支持和呼应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性，它的方式也与现代性内涵完全一致——就是改变乡村”，茅盾、赵树理及“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虽侧重点和路径有所不同，但走向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却是一致的，而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为代表的乡村书写在“现代性问题上的立场则是守望与回归，他们对乡村既有现实和文化持肯定和留恋的叙述，对现代文明于乡村的改变抱着明确的拒绝和批评姿态”。^[4]

如果说，鲁迅是走向现代，沈从文、汪曾祺是反现代的话，韩少功则是由“寻根”展开的对乡村与现代的想象，他试图糅合并超越二者，但这糅合的过程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这实际上也与八十年代相继而起的“鲁迅热”“沈从文热”——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呼应。现代性话语裂缝的产生不仅是对话语本身的质疑和一定程度的超越，同时也是现实或“真相”的涌现。韩少功对乡村展开的这一反现代的现代性想象，表现在其文本实践中，既造成了“多重语码的冲突和矛盾”，以致走进了“寻根”的困境，同时更重要的或许是在话语的裂隙与冲突中，一定程度上挣脱出现代性视野对乡村呈现的禁锢，促成了新的乡村“景观”的涌现。^[5]（210）

三、“寻根”中的批判与认同

韩少功指出：“寻根文学有不同的指向，有多种反思角度，但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寻根’文学在其实质意义上为本土的文化底蕴所渗透的现代性焦虑和一种杂糅本土和现代错综复杂关系的文本。”^[6]“在一个看似统一的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涌动着两种以上的话语”，它们构成“彼此冲突或自我消解的喧哗之声”。^[5]（205-211）《爸爸爸》中同时具有神话和反讽

两种关系，作者在背景设置上虚化了时间和空间，叙事情节上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人物的信仰和行为又极具荒诞性。文中丙崽父亲德龙这个人物的有无，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包括文本结尾丙崽母亲的突然消失，也是让读者一头雾水。丙崽永远长不大，不仅意味着这个人物的畸形与扭曲也暗示着世界与生命的停滞，作者将鸡头寨置于白云缭绕的深山之中，像是一个古老且被遗忘的世界边缘，这里的人依然过着与世隔绝、最原始的生活，他们坚信神话传说，为了宗族的生存而不惜喝毒汁丧命，无处不散发着一股原始、野蛮的气息。鸡头寨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远离现代世界的超稳定的时空，一种与现代文明相差迥异甚至隔着天然鸿沟的原始形态。鸡头寨所代表的乡村世界及其承载的乡村文化，一方面指涉并延续着以现代性为旨归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主题；另一方面则是对“现代的调侃，它并不被看作一种拯救、新生的力量”。

洪子诚在《丙崽生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一文中梳理、评析了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丙崽形象的看法，一是对小说所表现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二是对其所隐含的颂扬顽强的民族生命力的阐释。^[7]韩少功也反对把《爸爸爸》的主题完全理解为揭露“民族文化弊端”，他认为这部小说既有对停滞、封闭、野蛮的讽刺与批判，也有“对山民顽强生存力的同情和赞美，对他们强悍的原始生命力表现出一种肯定”。尤其当我们看到鸡头寨和鸡尾寨发生冲突时，“按照打冤家的老规矩，对敌人必须食肉寝皮，取尸体若干，切成了一块块，与猪肉块混成一锅，最能让战士们吃出豪气与勇气。”很多人无法下咽，“一位白胡子老人，激动地教诲：“同仇敌忾，生死相托，既是鸡头寨的儿孙，岂有不吃之理”？^[8]这段激扬人心的话已经让我们暂时忘却了这一愚昧的行为，更多的是被这样一种精神所震撼和感动。“文章最后写到老人们的自杀，写到白茫茫的云海中山民们唱着歌谣的迁徙，仿佛是带有一种高音美声颂歌的劲头”，人们从中并没有过多的感受到悲哀和凄凉，更多的情绪反而是悲壮中带有崇高，挽歌中带有希望。仿佛走向新生，这“或许是一种有些哀伤的颂歌”吧！

结语

《爸爸爸》这篇小说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对于传统的态度我们从文本中足以窥视到韩少功是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去书写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丙崽这个人物、鸡头寨这个地方归类于落后、保守、野蛮，从乡村书写史流变来看，就乡村与现代性这一核心命题来看，其更为重要的启示，或许在于对近百年乡村叙事现代性困境的探索与迂回式突破，它既进一步反映了乡村与现代这二元对立简单取舍策略对乡村复杂性的疏忽和偏离，同时也昭示着自此后的乡土作家们应从新的视野开启了对乡村“更加全面客观的权衡和书写”。

参考文献

- [1]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15页
- [2]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南京大学学报》2008，（05）。
- [3]韩少功：《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文汇报》2013年8月15日。[8]韩少功：《爸爸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2页